

Studies on French Activities in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n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19世纪中叶法国人在 川滇藏区的活动研究

——以巴黎外方会会士为主体的
历史学考察

刘瑞云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第三章 巴黎外方会会士罗勒拿在四川藏区的活动 …… (101)

第四章 巴黎外方会会士罗勒拿、肖法日在云南藏区的
活动 …… (115)

第一节 再次进藏路线的思考与探讨 …… (115)

第二节 罗勒拿由滇赴藏的准备及活动 …… (129)

结 语 …… (167)

参考书目 …… (170)





1745年，意大利嘉布遣会撤离拉萨，天主教会早期藏区活动中断。1821年，中国西藏-印度斯坦宗座代牧区（Vicariat apostolique du Thibet et de l'Hindoustan）成立，其代牧主教波尔基（Borghi）于1844年签署文件，将藏区教务临时委托给巴黎外方四川代牧主教马伯乐管理，授权其派遣巴黎外方会（l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 M. E. P.）会士重返藏区活动。1846年3月27日，拉萨宗座代牧区成立，其教务正式被移交给巴黎外方会管理。以上诸项事件揭开了19世纪中叶以巴黎外方会会士为主体的川滇藏区法国人活动的历史序幕。首先，巴黎外方会内部对在华教务持积极态度一派与保守派之间针对重返藏区传教之计划出现严重分歧；其次，由于清政府在当时严禁外国人越界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笔者注）进入中国内地，巴黎外方会因此在实施重返藏区传教计划过程中遭遇



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和艰险，历时十余年（1847—1858 年——笔者注），先后从中国内地的四川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拉达克等地尝试重返藏区，未果，最终选择由滇入藏，落脚云南西北部滇藏边境，潜藏于当地的崩卡山谷，这与他们最初设定的前往拉萨传教的宏大目标相去甚远。基于以下几点原因，本书将针对 19 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士在川滇藏区的历史活动展开研究。

第一，这场历史活动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针对西方基督宗教开始由“弛教”改行“弛禁”以及欧洲国家在华保教权开始向法国转移的重要历史时期，能够反映出经历清朝一百余年禁教之后的欧洲修会在华传教活动新动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强国在华殖民势力逐步上升，尤其是具有较强保教意识的法国，利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法使拉鄂尼的外交交涉为欧洲修会在华传教活动争取到一定的有利政策，这使得自康熙末年以来在华持续推行的“禁止天主教传华”的禁教政策有望“弛禁”。在此背景下，一直守候在南亚近藏之地的欧洲传教修会认为重返藏区传教时机已到，在波尔基的提议之下，决定由巴黎外方会前往重启藏区教务。与以上这种乐观态度并存的还有一种悲观态度，受托筹划藏区教务的巴黎外方四川代牧主教马伯乐便是悲观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尽管当时“保教”的法国已经开始触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但是，这不等于欧洲修会在华传教活动完全被解禁，清政府依然禁止欧洲修会会士在五口之外的中国内地活动，在此背景下重启藏区教务计划不可行。对清朝宗教政策新形势的不同解读，再加上相关各方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19 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内部就重返藏区传教计划出现巨大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欧洲传教修会在华活动新动向。

第二，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会士川滇藏区的历史活动能够反映出藏区教务对于天主教会的重要性。藏区教务历来都受欧洲修会的重视，早在17世纪初就有耶稣会会士从印度进入藏区活动；之后，在18世纪中叶，罗马教廷授权意大利嘉布遣会入藏活动。直到19世纪中叶，根据波尔基的提议，藏区教务被转移至法国的巴黎外方会，意味着欧洲修会在离开100余年后即将重返藏区，体现了欧洲修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藏区教务的高度重视，能够反映出藏区教务对于天主教会的重要性。

第三，这一历史活动的进程和结局能够从侧面映射出19世纪中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清朝中央政府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已经就清朝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衰落基本达成共识，而因此常常忽略清政府于当时在对外关系中的强硬一面，对当时清廷于西南边疆地区强有力的政治统治更是关注甚少。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列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清廷的权威，但它们却尚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其深厚根基，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交往中也并非是全线节节退让。比如，1846年至1849年之间，清政府曾严格依照中法《黄埔条约》中关于“严禁外国人越界通商五口、进入中国内地活动”之约定，将10余位潜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传教修士^①坚决予以逮捕并驱逐，其中便包括1848年在察木多（今西藏昌都——笔者注）

① 本书当中出现的“传教修士”一词均指的是欧洲修会派往海外开展传教活动的修会会士，而非神职教阶意义上的“修士”。



逮捕并驱逐巴黎外方会会士罗勒拿 (Renou)。^① 15 世纪以来, 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等措施大举开拓并发展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川滇藏区虽为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边缘地带, 经过前期的积极经营, 清朝中央政府对之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能力。19 世纪中叶, 清政府禁止巴黎外方会会士罗勒拿等从四川、云南等地进藏, 对巴黎外方会重返藏区传教计划的实施形成强有力的阻击。清廷禁止法国巴黎外方会会士进入藏区的强硬政治态度和外交立场, 体现了其不容西方擅入内地、染指藏区的对外政策, 其在对藏统治方面的坚持, 是以后历届中央政府一直秉承的态度, 具有积极意义。

二

笔者撰写此书意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 笔者撰写此书意在推进国内学界对欧洲修会巴黎外方会的研究, 尤其是要推进国内学界对近代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的研究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国内学界对外国来华修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耶稣会的研究上。进入 21 世纪后, 虽然这一现状开始得以改善, 逐渐由以往的以对耶稣会研究为主拓展至对其他来华修会活动的研究, 但是, 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始终难以摆脱一

① 依据当时法国驻华领事北古写给当时法国外交部部长基佐的信件, 最早因此禁令被从中国内地驱逐的外国传教修士名为卡拉叶尔 (Carayor) 国籍不详; 其余几位为西班牙传教修士纳巴罗 (汉名陆怀仁), 法国传教修士古伯察、秦噶啐、牧若瑟、铎德魏、罗启楨 (即罗勒拿——笔者注)、意大利传教修士李若瑟、多肋等。参见: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aris,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Chine 25, Tome 2: 105 - 10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第一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年, 第 16 - 42 页。

个现象：“对耶稣会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而研究其他修会则基本阙如。”^①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和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方面，耶稣会的确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力。但是，耶稣会只是近代来华欧洲修会之一，耶稣会在华活动史不是欧洲修会在华活动史的全部，该会针对中国上层士大夫开展活动的传教策略也使它对广大基层及边缘社会的影响较为微弱。然而，法国巴黎外方会对中国边疆地区及边缘底层社会形成的影响则十分突出。巴黎外方会于17世纪下半叶进入远东之际就确立了“培养本土神职人员”“天主教传播本土化”等传教活动纲领，18世纪前后来华又逢中国“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之宗教政策日趋严厉；再者，耶稣会、遣使会等老牌欧洲传教修会已经先期占据中国中原地带传教多年。在此背景下，巴黎外方会在华传教势力范围主要形成于我国西部和南部的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东北三省等远离中原的地区；而且，该会主要针对中国广大基层民众开展传教活动。所以，要研究外国来华传教修会对中国边疆地区和基层大众的影响，就必须加大对巴黎外方会在华活动史的研究。

然而，据笔者掌握，国内学界对法国巴黎外方会来华活动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尚无针对“19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川滇藏区活动史”翔实的学术研究专著，相关著作也只有寥寥几本：其中有余素先生的《清季英国侵略藏区史》^②，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对17—18世纪欧洲修会藏区早期活动进行了述评，研究内容未涉及近代巴黎外方会在藏区的活动；伍昆明先生的《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③是关于17—18世纪欧洲修会藏区传

① 汤开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从〈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第18页。

②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藏区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③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教活动的一本专著，内容翔实，论证深入，但是受限于研究时段，亦未能详细述及近代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秦和平先生的《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①与韩军学先生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②对包括新教在内的西方基督宗教西南民族地区传播历史进行了研究，两本著作亦是简略述及近代巴黎外方会在川滇藏区的活动，所以相关研究亟待拓展和深入；刘传英老师的《巴塘藏民反教卫国斗争史略》^③则是针对近代欧洲修会在藏区活动中后期遭遇巴塘地方民众抵制而产生的教案冲突研究，研究内容未涉及巴黎外方会会士于 19 世纪中叶在川滇藏区的历史活动。相较于学术专著，国内学界关注并研究欧洲传教修会藏区活动史的学术论文数量相对多一些。但是，这些期刊文章要么只是在其论述过程中简略提及相关史实，要么就是针对 17—18

①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② 韩军学：《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③ 刘传英：《巴塘藏民反教卫国斗争史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世纪中叶早期欧洲传教修会藏区活动史^①或者 19 世纪后半叶及 20 世纪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的研究。

(二) 笔者的这本著述将使国内学界在“近代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研究”这一领域实现在研究资料挖掘上的新突破。

澳门大学的汤开建教授曾经指出：“任何历史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取决于材料。”^② 19 世纪中叶欧洲修会重返藏区活动计划形成与实施的主体为法国巴黎外方会，其总部设在法国巴黎，那里存放有大量该会从事海外教务活动的法文原始档案资料，其中便包括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的主体资料，这些档案史料对研究近代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国内学界恰恰缺乏对这些重要史料的占有。出于以上原因，国内学者至今尚未对近代巴黎外方会藏区活动史进行全面且纵深地研究。这也使得目前由掌握法语语言工具的国内学者

① 主要关于 17—18 世纪早期天主教在藏区传播历史的学术论文：曾文琼的《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西藏研究》，1985 年第 4 期）、朱解琳的《帝国主义对藏区的文化侵略述评》（《西北民族研究》，1986 年）、王永红的《略论天主教在藏区的早期活动》（《西藏研究》，1989 年第 3 期）及南措姐的《基督教在藏区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西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关于 19 世纪后半叶及 20 世纪天主教藏区传播历史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其中针对这一时期内先后发生的巴塘教案的研究颇多：徐铭的《清末帝国主义在川边藏区的侵略活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2 期）、饶斯丹的《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康区藏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斗争论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 年政治思想工作研究专辑）、秦和平的《关于盐井刚达寺驱赶天主教士杜仲贤的认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保罗和泽拥的《盐井天主教史略》（《西藏研究》，2000 年第 3 期）、刘传英的《巴塘反洋教斗争论纲》（《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87 年）、张学君的《巴塘教案与清政府对藏区政策的变化》（《中国藏学》，1992 年第 3 期）、王炎的《梅玉林事件发生地考实》（《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王晓的《巴塘教案两则述论》（《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2 年第 13 辑）、《巴塘教案述论》（《民族论坛》，2013 年第 10 期）及《晚清巴塘梅玉林案考述》（《藏学研究》，2014 年第 2 期）等。

② 汤开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从〈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 年第 10 期，第 20 页。



利用法文原始档案资料开展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得以凸显。笔者从 2002 年开始从事法语专业语言教学与研究，迄今已有 16 年，对法语的熟练掌握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工具基础。笔者 2012 年考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攻读“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利用 2014 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访学一年的宝贵机会，前往法国巴黎外方会的总部，搜集到了第一手的法文原始档案史料，在对这些原始史料进行潜心研究的基础之上撰写此书，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视角更为多元，论著分析更为贴近历史事实。

本论著的撰写过程也曾面临不少的困难。由于本论著研究的史实发生在年代久远的 19 世纪中叶，其原始档案史料愈加显得弥足珍贵。19 世纪中叶，为商议重启藏区教务，欧洲修会内部曾有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为获得欧洲殖民势力对进藏活动的支持，欧洲修会与西方殖民国家在华外交势力之间也有一定数量的信件往来，这些信件便是支撑本著作研究原始史料的主干。首先，这些原始信件档案史料的搜集就非常困难；其次，由于 19 世纪中叶尚未发明打字机，这些信件档案史料均为手稿，且出自不同的传教修士之手，因此字迹各异，不乏难辨之作，对其进行辨识不仅耗时而且费力，是本研究的又一难点所在。最终，笔者在对上述难点一一克服的基础之上撰写了这本著作。

总而言之，本书将主要利用丰富、鲜活的原始档案史料，充分参考前人的相关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考据法开展研究，对 19 世纪中叶巴黎外方会川滇藏区活动历史进行评述，力争做到“用可靠的史料做客观的研究”，力争弥补国内学界对欧洲修会在华活动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力图实现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创新。



早期欧洲修会藏区活动历史回顾

第一节 欧洲修会早期进藏活动史实概述

15 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海上强国逐步掀起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浪潮，一些欧洲修会及其会士们也随之大规模走向海外。葡萄牙于 1510 年占领印度果阿（Goa）及其部分西海岸，在果阿建立总督府。很快，耶稣会也随之进驻果阿。1581 年，旅居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耶稣会会士蒙塞拉特（Montserat）在一次跟随阿克巴大帝巡视途中，在旁遮普的卡拉瑙尔（Kalanaur）听当地人讲述孟加拉地区（bengal）以东、喜马拉雅山那边居住有一名为“博坦”的民族，所信奉宗教与基督教^①在教义、仪轨等许多地方都很相似。^② 从此便传言喜马拉雅山麓存

① 本书作者笔下的“基督教”如无特别说明一般指罗马公教——天主教。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第 61 页。



在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或国家。正是在这一传言的激励下，欧洲修会早期进藏活动史的序幕被拉开。

17 世纪初至 18 世纪中叶，部分欧洲修会会士分两个阶段先后进入中国藏区传播天主教，被视为欧洲修会的早期进藏活动。这些早期进入藏区活动的欧洲修会会士分属两个不同的天主教传教团体——耶稣会和意大利嘉布遣会。其中，在印度果阿（Goa）教省和马拉巴（Malabar）教省活动的耶稣会会士们是早期进藏活动第一个阶段的主体，包括以安德拉德（Andrade）为首的果阿教省耶稣会会士们（下文称果阿耶稣会——笔者注）在西藏古格地区（1624—1635）、以卡塞拉（Cacella）和卡拉布尔（Cabral）为首的马拉巴教省耶稣会会士（下文简称马拉巴耶稣会——笔者注）在西藏日喀则地区（1628—1632）；早期进藏活动第二个阶段的主体是意大利嘉布遣会，该会在藏区的活动持续时间较长，从 1704 年到达拉萨到 1745 年完全撤离，前后断断续续经历了 41 年。^① 意大利耶稣会也曾参与第二个阶段的藏区教务活动，该会会士德西德里曾于 1716—1721 年在拉萨短暂传教。^②

一、以印度果阿和马拉巴两教省耶稣会会士为主体的早期进藏活动第一阶段

一直以来，亲履藏区证实蒙塞拉特所听到的关于“博坦民族信仰基督教”的传言对于耶稣会乃至罗马教廷来说都很重要，是关系到开拓新教区及发展天主教会势力的大问题；如果这一传

①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45～499 页。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年，第 530～587 页。

言被证实，罗马天主教会就会增添新成员，如果藏区没有基督徒，就要使之归化。^①

（一）扎布让传教会

最早到达中国藏区并开展教务活动的是以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P. d'Andrada，又译为安多德、安夺德——笔者注）为首的印度果阿耶稣会的会士们。在一次陪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汉吉尔出巡过程中，安德拉德神父从一队要到德里东北一座印度庙朝圣的香客处得知，从这座神庙继续前行就可以到达“有基督徒”的藏区，他甚至来不及向果阿耶稣会会长请示便决定前往藏区一探究竟，如果关于“博坦民族信仰基督教”的传言得到证实，就要让他们回归天主教会的大家庭，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宗教，就要使之归化。^②

安德拉德一行于1624年3月30日从阿格拉（Agra）出发，经德里（Delhi）翻高山、穿峡谷、跨河流到达克什米尔首都斯里那加（Srinagar），在穿过一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荒漠之后，从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南边的马纳山口翻越喜马拉雅山，于1624年8月抵达我国西藏阿里南部地方政权古格王国的首都扎布让（Caparangue，位于今藏区阿里札达县境内——笔者注）。^③高耸的喜马拉雅山上，道路十分艰险，此外，持续的暴风雪使安德拉

①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页。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20页。

③ A.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Tome I,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1, p. 23. 伍昆明先生不认同劳内、古伯察等人关于“安德拉德到达的是克什米尔的首都斯里那加”的观点，而认为他到达的是加瓦尔王国的首都斯里那加，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说法。参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25～126页。



德一行几乎寸步难行。到达扎布让后，当时的古格王国国王犀扎西查巴德向安德拉德证实当地并无传言中所说的基督徒，后者便决定留下来向古格国王及其臣民宣播基督教。^①

可能是受耶稣会一贯“走上层路线”传教策略的影响，安德拉德一行首先设法取得了古格王室对基督教的肯定和支持。为了亲近古格国王及其王室成员以顺利传教，除了宣传基督宗教教义的正确性之外，安德拉德一行还通过揭穿和抨击藏传佛教的错误来宣传基督宗教。恰巧当时的古格王与以其弟、叔父、叔祖父为首的格鲁派寺院僧人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政治矛盾，耶稣会会士们批判藏传佛教的做法使古格王产生了利用基督宗教来抗衡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想法。因此，果阿耶稣会会士们的传教活动很快便获得了古格王室的支持。在随后的几年里，以安德拉德为首的耶稣会会士们针对古格王室成员及古格百姓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不仅在扎布让修建了藏区第一座天主教堂，还在离扎布让约200公里的日土设立了另一个传教点，教徒人数最多时至400余人。^②

安德拉德一行所取得的传教成绩对藏传佛教利益集团形成了严重警示，致使其坚决抵制耶稣会会士在当地的活动。^③ 1630年，格鲁派寺院集团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反对藏传佛教的古格王

① A.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Tome I,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1, p. 27.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161-167页。

③ 特别是古格国王的弟弟和叔叔，他们被特别委派去劝说国王远离基督教，使之放弃领洗的决定；他们对国王做了这样的劝说：“如果一个刚刚到达六个月的外国人可以使他（国王）抛弃父辈的信仰而去拥抱着一个他并不真正明白的宗教的话，那将是何等的耻辱……”参见：A.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Tome I,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1, p. 29.

犀扎西查巴德的统治，失去靠山的古格传教会同时也遭受到严重打击，扎布让和日土的传教站几近完全被摧垮。果阿耶稣会不甘心就此结束在藏传教活动，于1635年初派遣以科勒斯玛（Coresma）为首的7人小组奔赴扎布让以对那里的传教会形成援助，其中只有科勒斯玛与一位名叫科里亚（Correa）的会士最终到达扎布让，其余五位当中，两人死在途中，三人病倒。^① 到达藏区的会士们在扎布让的活动举步维艰。同年年底，古格当局勒令耶稣会会士科勒斯玛一行撤出古格地区。迫于古格当局的压力，果阿耶稣会会长塔瓦勒兹（Tavarez）在同诸神父商议之后同意关闭古格传教会，理由有两点：其一，藏区人民未能跟上会士的工作；其二，果阿教省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资给古格传教会。^② 会士们随后撤出古格地区，扎布让传教会被关闭。之后，果阿耶稣会并不甘心失败，曾几次尝试派会士重返扎布让。首先是果阿耶稣会会长塔瓦勒兹并不愿意放弃古格传教会，他于1636年先后派三位神父进驻克什米尔首都斯利那加，以伺机返回扎布让活动，未果；其次，印度有一部分耶稣会会士对古格传教会被关闭的结果不满，写信给罗马耶稣会总长穆奇奥，要求重振古格传教会；穆奇奥赞同这一提议，责成果阿耶稣会重振古格传教会，四位会士因此被派驻斯利那加以伺机重返藏区，但是受阻于扎布让当局，耶稣会最终未能重启古格传教会。^③

（二）日喀则传教会

在古格境内活动期间，安德拉德得知扎布让东面有一个叫卫

①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藏区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页。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49页。

③ 朱解琳：《帝国主义对藏区的文化侵略述评》，《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292页。



藏的地区，是整个西藏和喇嘛教的中心，于是写信给果阿耶稣会会长，请他建议马拉巴耶稣会会长拉埃尔西奥（Laercio）神父派会士前往孟加拉地区以东更远的地方开辟新的传教活动区域。^①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拉埃尔西奥从中亚来的商人那里听说，西方人探寻已久的震旦就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与西藏接壤的地区，于是命卡塞拉、卡布拉尔等会士经由西藏前往震旦^②。

受拉埃尔西奥会长经由西藏寻找震旦之命。1626年3月，马拉巴教省耶稣会会士卡塞拉神父（Cacella）、卡布拉尔神父（Cabral）及丰泰伯纳修士（Fontebona）从印度马拉巴教省出发，前往藏区。以上三人当中，除丰泰博纳因病在途中离世之外，卡塞拉和卡布拉尔经达卡、库奇-比哈尔（Kuch Bechar）、库奇-哈约（Kuch Hajo）、不丹于1628年正月抵达中国西藏日喀则。^③耶稣会会士们在到达日喀则后受到了当政者藏巴汗的欢迎和支持，再加上对震旦信息打探进展得很不顺利，他们便决定暂时留下来创建日喀则传教会。^④但是，日喀则传教会在创建后并未存续太长时间，卡塞拉神父于1630年死亡；之后，唯一留守日喀则的会士卡布拉尔也于1632年离开日喀则；次年，日喀则传教会被宣布正式关闭。在日喀则传教会短暂存续期间，没有看到有新教徒付洗之类的报告或消息，这说明传教工作在那里并未真正

① 曾文琼：《清代我国西南藏区的反洋教斗争及其特点》，《藏区研究》，1985年第4期，第49页。

②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③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藏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4页。

④ 有的学者认为，藏巴汗支持会士是因为后者向他提供了丰厚的礼物，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藏巴汗背后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想利用基督教对抗格鲁派势力集团。参见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藏区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5页；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86~289页。